收稿日期:2021-05-12

认知视域下的语法化和构式化研究概述

王山林

(广州中医药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语言历时的演变源于语言的共时使用,其基本机制是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与使用频率固化效应的协同作用。阐释语言使用中重新分析、类推和频率固化等三个主要认知机制及其在语言历时演变中的具体表现,可以梳理认知机制对于语言历时演变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反思当前认知视域下的语言历时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在历时语料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互动基础上建立"反馈环"可以作为未来主要努力方向,将加深对过去人们认知处理能力的理解,还可揭示认知过程的本质与不同认知进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将来的共时研究。

关键词:历时研究;认知语言学;重新分析;类推;频率固化;语法化;构式化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6-0018-11

作者简介:王山林(1982—),女,四川达州人,广州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6.076

语言的历时研究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分支:一是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考察不同语言在语音、词汇以及句法上的相似性来重构它们之间的历史亲缘关系;二是词汇化,考察非词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变为词的过程;三是语法化,指实在语义转化为非实在语义,实词转化为表语法功能的成分的过程或现象。随着研究的深入,语法化研究将语言单位置于更宏观的语境中,引入构式语法框架来解释历时句法问题。词汇化、语法化和构式化都与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认知语言学诞生时,其根本出发点是共时语言现象,当时提出的各种理论,如原型理论与范畴化[1]、隐喻与转喻[2]、心理空间与概念合成[3],关注的重点是认知因素在语义构建和语法表征及生成中的作用。但几乎就在认知语言学诞生伊始,历时因素就已融入其中。早期的历时认知研究有三个关注的焦点:原型理论与范畴化[4-5],语义扩展与变化的方向性[6-7],历时与共时关系[8-9]。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时因素越来越多受到认知语言学的重视,开启了交互主观化的语言演变机制研究[10],形成了认知理论与类型学[11]、认知社会语言学[12]等分支。

本文旨在梳理认知机制在语法化和构式化演变进程中的作用:首先介绍在语言历时演变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认知机制,然后具体探讨其在语法化和构式化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最后提出语言

的历时认知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一、语言演变过程中的认知机制

语言的认知表征以使用为基础,且由语言使用构建。语言的认知心理研究表明说话人的语言产出受一系列认知结构与过程的影响,包括类推(analogy)、融合(blending)、范畴化(categorization)、组块(chunking)、具身(embodiment)、固化(entrenchment)、框架(frame)、隐喻与转喻(metaphor & metonymy)、启动(priming)、先用(preemption)、图式化(schematization)等[13]194。语言与语言结构一直在不断变化中,共时的语言变异受认知机制的作用,历时的语言变化与发展亦是如此。语言共时变异所涉及的认知机制,与驱动语言历时演变的认知机制并无二致,具体包括重新分析(reanalysis)、类推(analogy)和频率固化(frequency-based entrenchment)等。

(一)重新分析

重新分析的概念由 Ronald Langacker 首次提出,其核心要义是“一个表达结构句法功能的内部变化,不会即刻改变该结构的表层形式,但常导致成分之间边界的建立、迁移或者消失”[14]。重新分析是语法化一个重要机制。以表将来的 be going to 为例,Paul J. Hopper 与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认为其演变的主要机制是重新分析和类推。例如 Sheldon is going to visit Delby,句中 to 已不被视为引介目的小句 to visit Delby 的介词成分,而被重新分析为从属于动词 going,即 Sheldon is going [to visit Delby]被解析为 Sheldon [is going to] visit Delby。这一转变由转喻触发:要拜访某人,必须得前往某地,这是完成拜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77。于是新的层次结构开始浮现:is going [to visit Delby]变成[is going to] visit Delby。be going to 被看成是一个整体,用来表征将来的行为。

围绕重新分析,也产生了不少争议。Traugott 认为,“重新”两字值得商榷,因为假设二语学习者或儿童从未接触过某结构,对该结构的识解与分析不同于其本义,充其量只是不同的分析而已,故称之为“新分析”(neoanalysis)或许更恰当[16]63。Hendrik De Smet 认为,重新分析在逻辑上不成立,因为重新分析意味着新范畴的产生源于结构歧义(structural ambiguity),即这种歧义只“存在于语言变化发生之后”[17]。另外,Joan Bybee 指出,从认知功能分析的角度看,重新分析基于一种假定——共时语境下的语法只允许一种结构分析的存在。然而,若人类认知系统允许冗余和多种分析共存,那重新分析只能视作对已有分析的补充,随着时间流逝却可能成为唯一存在的分析[18]120。

总之,重新分析是语言使用者对语言深层结构的组合关系重新切割、组块、意义重塑的过程。从本质上讲,语言演变是语言学习者重新分析的过程[19]637。

(二)类推

作为一种认知过程,类推将某个特定事物所附带的讯息转移到其他特定事物之上。语言学中,类推是指一个语法格式的表层形式的变化,不会马上带来深层结构的改变,而旨在对业已形成的句法规则进行推广和应用[20]97。传统的类推变化主要指形态音系变化,尤其是范式内部形态的交替拉平或消失,或范式间的交替扩展。

1. 形态变化

形态层面的类推主要有两类:类推拉平(analogical leveling)和类推扩展(analogical extension)。类推拉平,也称范式拉平,指词位从一种曲折变化范式转变为另一种范式,通常是从

非规则到规则形态。英语强动词的过去式、过去分词,除少数动词如 go / went / gone 外,大都经历了范式拉平,如 weep / wept / wept,近年来人们开始使用其规则形态过去式、过去分词。Bybee 认为,类推拉平更容易影响频率较低的语项,高频语项不易受影响[18]66。不受拉平影响的形态交替语项大多是某一范式中最基本且出现频率更高的无标记成员。因为高频会导致语项固化程度的加深,更易作为整体被提取。

类推扩展是指某一词项受与之形似的词项的影响,采取与后者相同的形态变化。以 cling / clung / clung 和 fling / flung / flung 为例。自古以来英语就存在元音交替现象,string / strung / strung 出现元音交替则是在 16 世纪后期,“fling 之于 flung,正如 string 之于 strung”。然而,strike / struck / struck 的交替有何理据呢?毕竟 strike 和 cling、fling、string 元音不同,韵尾也不一样。Langacker 认为这是基于过去式/过去分词常用图式,具有相似音位特征与意义,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适当调整以适应图式系统[9]178。音位参数并非绝对的,而是处于家族相似性的关系网络中。原属图式大多是软腭鼻音 ng,不带鼻音的颚音 k 逐步被纳入图式系统,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再扩展至以颚音 g 结尾的动词,比如 dig / dug / dug。

类推扩展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呢?Bybee 等人的实验表明至少需要 6 个词项呈现出较大的音位相似性,达到所谓“群聚效应”(gang effect),才可吸引新的组员(词项)加入[21]。另外,组群中除极高频词项外,大多数成员需保证足够的使用频率以维持其不规则形态。若组群具有较高的类符频率,其形态创新不必与组群其他成员一致;但若组群类符频率低,则必须与其他成员形态创新保持高度一致。总之,类推扩展取决于两个因素:组群的音位特征与组员数量[18]963。

2. 句法变化

现代英语中的情态动词(can、could、may、might、must、should、will)源于中古英语时期。彼时,情态动词与常规动词用法无异。但这些情态动词并不是同时产生的,may 最早开始发生变化,紧接着是 can 和 will[22]。促成这一变化的就是类推。说话人留意到几个词形结构和功能的相似之处,比如都能接否定词,疑问句中前置,用于反义疑问句和表强调。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使用频率的增加,有着相似结构和功能的词形构成情态动词这一新的词类。又如 be going to,在完成句法横组合关系的重新分析后,该结构不再只限于表达移动或目的义,更多其他动词开始填充 be going to 后面的空位,而这一过程的基本机制就是类推扩展[15]87。而更多的动词进入,又进一步使得该空位对于动词准入条件更加宽泛,直至 like 之类的非动作动词也能进入其中,此时,be going to 已成为一个半助动词,通常被当成一个整体,并具有助动词功能。

重新分析与类推扩展被认为是语言内部形态句法变化的两种主要机制[20]52。重新分析改变言语社团有关某词或结构原本内化的语法知识,但并不影响原有词形与句子结构。类推扩展则刚好相反,原有词形或句子结构会发生改变,但不影响旧有的分析框架。类推和重新分析共同作用于语法化过程:前者负责拓展规则的适用范围或新词形的使用语境;后者负责改变规则与创新形式[19]。两者互相补充,重新分析变化于无形,类推扩展则以有形变化为特征,类推扩展有形变化的背后却常常由重新分析的无形变化所驱动[23]7。

(三)频率固化

频率是否应被归为认知因素的一种,还存在争议。然而,频率造成的固化效应确是认知维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知心理学认为在某一语境中是否使用特定的语言单位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突显度和频率。但人类大脑更倾向于留意、识记并使用以往使用频率较高的语言形式,而不论其突显度。高频词形,即便形态不规则,但若频繁复现而产生固化效应,更易被大脑储存并

提取。而低频词形更易受到类推的影响,呈现规则形态,即前文提及的类推拉平[13]198。古英语 330 个强动词中只有不到一半仍然活跃于现代英语中,形态呈现不规则变化,其余大多因类推演变成弱动词。反复使用会导致结构或词条的常态化(routinization),致使其语音、意义或形态句法特征发生改变。同时,高频使用还会催生新意义或新结构的浮现,并在使用者的心智中得到表征。

二、认知机制在语言历时研究中的应用

在认知理论框架下分析语言的历史嬗变及其动因,从历史语言学视角分析语言的认知机制,都是历时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议题。在语言的历时研究中,认知机制研究出现三个比较重要的研究领域,分别是词汇化、语法化以及构式化,下文主要聚焦语法化和构式化,并分别论述相关认知机制在语法化和构式化研究中的作用。

(一)语法化

作为一种语言变化形态,语法化指一个语言单位的词汇意义不断弱化、语法意义不断增强,从而转变为一个语法单位的过程或结果。广义的语法化与历时性、具有方向性的发展演变无必然关联,泛指"成为语法的一部分"。我们通常提及的"语法化"概念是狭义的,意指那种跨越一定时间且导致语法性特征增加的单向性演变。语法化本身并不是新的概念,早在 1912 年就由 Antoine Meillet 首次提出,指"赋予一个独立的词以语法特征,使之不独立"的过程。Nikolaus P. Himmelmann 认为语法化是"一种语境扩展过程"(a process of context-expansion),"语法化的不是单个词项,而是语法化项目所在的句法组合语境,即构式"[24]。

认知功能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结构在语言使用中浮现,语法化研究的深入将研究者引向基于使用的语法[25]69。语言使用如何促进语音、语义、形态句法层面的语法化进程?句法结构如何从认知表征中衍生出来?看似孤立、分散的语法特征在语法化中如何逐渐变化?下面分别从语音、语义和形态句法三个层面穿插相关认知机制进行探讨。

1. 语音弱化与频率固化

言语产出离不开神经运动,语流意味着连续的肌肉活动[18]70。语串或单位序列,如 going to、want to、have to 等因频繁使用会凝固成块,发音动作强度降低,语块的内部成分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协同发音。这导致单位序列的语音发生弱化,如 going to 弱化成 gonna, want to 弱化成 wanna、have to 弱化成 hafta[25]70。组块是高频共现固化的结果,且经常伴随出现语音弱化,可独立于语法化外而存在。

2. 语义演变与频率固化

高频使用可增强组块内部的凝固性,并弱化其可分析性,而组合性与可分析性的减弱则可进一步导致语义语用的变迁。如 be going to 或 in spite of,原本由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但由于反复使用而作为整体在心智中被处理和提取。这类打包重组(repackaging)会产生两种结果:(1)各构成成分的身份变得模糊;(2)整体有可能发生形式缩减。把组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从整体上赋予组块以语用功能与意义,将削弱组块意义的组合性。以 in spite of 为例,spite 原指"恶意、怨恨",在 in spite of 中此意义已荡然无存。其后所接的名词亦由最初的表人,后来泛化至表示各种障碍,包括人、法律法规、文化传统、物体等。

语义概化造成原义淡化,可扩展语言单位的使用语境,同时语境中的意义解读也变得更加开

放[25]72,更加依赖语用推理,成为语义演变的重要补充。例如"Mainstream media hold that she's been doing well in spite of being female president."一句,in spite of 可推导出为"与期待相反(背离预期)"之意。若这种语用推理被频繁使用,相应的推理义会被去语境化,成为语言单位的规约义。因此,隐含意义规约化以及语用强化都与语言单位的使用频率息息相关。

3. 形态句法变化与重新分析

很多学者将语法化定义为重新分析,即成分结构与范畴的渐变。语言作为动态系统,总是处在变化中,语法化进程也是渐进的。因此,共时范畴的划分并无清晰界限,比如助动词和动词的区分就比较模糊。Hopper、Bernd Heine 等人将范畴归属的改变称为去范畴化,即名词或动词在变为语法成分的过程中失去原本形态句法特征的过程[26-27]。比如:名词 spite 失去了原有的名词属性,成为复合介词的一部分。作为复合介词的 in spite of 整体自主性更强,内部可分析性降低,直到到达某一临界点,in spite of 作为组块已完全独立于 spite 之外。随着 spite 作为独立个体名词属性的消失,in spite of 的成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语音、语义、形态句法三个层面的变化都指向语法化的单向性。语音层面表现为高频固化导致的语音弱化;语义明显由实变虚,高频导致的语义凝固削弱其组合性意义,而更多借助于语用推理;形态句法方面表现为去范畴化、可分析性缺失、自主性增加、成分结构减缩等。即便此后使用频率逐渐降低也无法逆转语法化的进程,即不存在所谓的去自动化(de-automatization)或去惯常化(de-habituation),也不存在语用推理的减弱等[25]77。

4. 句法的类推扩展

Traugott 总结传统语法化研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关注语法化项的"减缩"及依附性渐增,亦被称为"窄化效应",即自主性受限,对其他成分依附程度增加[28];二是着眼于语法化过程中的各种"扩展",包括语义-语用扩展以及句法-搭配扩展,如同构项扩展,即能与语法化项构成组合关系的成分类别的增加。Amanda L. Patten 发现英语中的 it 分裂句,从最初只能接名词成分(It was the butler that killed them.),扩展到可接介词短语(It's in December that she's coming.),甚至从句(It's because you cheated that you won.)[29]。这一过程正是 it 分裂句后所接成分从词→短语→从句的类推扩展。

不同语言中类似的词汇范畴会演化成类似的形态范畴,形成具有共性的"语法化路径"[30-32]。例如,许多欧洲语言中的不定冠词来源于数词"一",如英语的 a / an,德语的 ein,法语的 un / une,西班牙语的 un / una,希腊语的 ena,等;定冠词通常源自指示代词,如英语的 that 变为 the,拉丁语的 ille / illa 变为法语的定冠词 le / la 和西班牙语的 el / la,等[33]112。再如,保加利亚语、罗马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以及非洲班图语支中表"想要"的动词都演变出了将来时标记,与英语的 will 类似[33]143。语法化路径呈现出高度的跨语言规律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法化涉及的语义变迁是由转喻和隐喻映射驱动的。转喻与隐喻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重要认知手段,也是人类语言认知处理的共通机制。转喻和隐喻映射具有较高的跨语言文化一致性,比如"时间即空间"[18]113,这使得类似的语言项目在不同语言中遵循着类似的语法化路径。Heine 等人提出,语法化过程中的隐喻扩展一般遵照特定的序列:人→物→过程→空间→时间→性质[27]157。be going to 由表"移动"到表"将来"的路径,其语义演化就是从空间义到时间义的隐喻映射——在一定空间朝着目标移动,时间也随之逝去。虽然转喻与隐喻并非本文重点关注的认知机制,但在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变化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Hopper 和 Traugott 指出,对 be going to 第一次重新分析由概念转喻诱发,再由隐喻触发类推进而扩展语义[15]88。在 Hopper 和

Traugott 看来,基于邻近性(contiguity)的转喻,与重新分析息息相关,基于相似性(similarity)的隐喻则与类推关系密切[15]88。

总的来说,历时句法研究对于语法化的考察不够严谨缜密,狭隘地聚焦于“词语→语法形态”单一层面,舍弃了复合结构的构式语境。后来,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大于词语单位的句法变化,如从句,并引入构式语法框架来解释历时句法问题,其中往往涉及整个构式的重新分析、构式成分的类推扩展等认知议题。

(二)构式化

有学者在语法化研究中将语言单位置于更宏观的语境中。Talmy Givón 早在 1979 年便提出了将语篇结构融入句法结构的“句法化”概念,可视为构式理念初创的标志。Traugott[34],Heine[35],Bybee[36]和 Givón[32]都认为应将整个构式纳入语法化考察。这也使得构式变化与构式化成为近十年句法变化研究的新方向。何为构式? 某一语言中形式与意义的配对即为构式,小至词缀,大至复杂从句都可被视为构式[37]。构式的组成成分可以是具体的词语,即实体构式,如 kick the bucket;也可以是抽象的语法范畴,即图式构式,如 V+N+N。Evie Coussé 等人认为,构式语法同时关照语言形式与意义,正如语法化研究既涉及形式变化,如语音弱化,又触及语义演变,如语义淡化[38]4。因此,两者相互兼容,形成天然盟友。一方面,构式的无所不包以及多面性很容易将意义、形式、历时发展、心理表征等概念涵盖其中;另一方面,构式框架允许研究者将实体构式与图式构式都囊括进来[39]。已有很多学者意识到组合关系(即前后词语境)在语法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构式这一概念更能准确地描述语法化所依赖的句法环境,以及语言单位形式和语义/功能的嬗变,因此语法化研究的构式转向是一种必然。

1. 构式化与重新分析

构式框架内的历时研究有两个重要区分:构式变化和构式化。Martin Hilpert 认为构式变化选择性地发生于规约化的构式上,使其形式、功能、频率、分布或上述项目的任意组合发生改变[40]。Traugott 等人认为,单纯形式或意义的变化为构式变化(调变),而形式与意义协同伴随变化(concomitant change)则为构式化(再创),即形成新形式新意义的配对[41]1。构式变化不一定产生新的节点,不一定产生新构式,构式化则有新构式诞生。体现构式性演化的一个例子就是表将来意义的 going to 发生形式上的聚合,变为 gonna,但意义保持不变。与此相对,认为 going to 的历时发展则属于构式化,因为形式和意义都发生了变化[16]71。

构式化进程可粗略分为以下三阶段:(1)语义发生变化后开始用于新语境,一旦该用法规约化,也就实现了从原语义(Sem1)到新语义(Sem2)的转变;(2)新语义(非组合意义)又会触发原语义句法结构的重新分析,因此原句法(Syn1)又演变成新句法(Syn2),但句法结构的重新分析在研究者看来是无形的,因为新句法的表层形式与原句法结构无异;(3)重新分析后,原句子结构 Syn1 和语义 Sem1 不变,而新句法 Syn2 和语义 Sem2 因重新分析而联结,从而催生新形式与重新分析后的句子成分相匹配,这一过程被认为是重新分析从无形到有形的具现过程(actualization)[23]17-18。只有当形态句法、语义重新分析在社会网络中普遍规约化后,新的构式或图式并入构式网络,才意味着新的类符节点被创造[16]56。也就是说,Traugott 等人所说的构式化只发生在重新分析具现化这一阶段,即第三阶段[41]229。

2. 构式化与类推扩展

构式化建立在对形式和意义进行一系列连续重新分析的基础之上,这一过程往往也伴随着

图式化以及能产性和组合性的变化。图式化程度的改变意味着形式和意义抽象性的增加或减少；能产性的改变主要和新类符构式的发展相关[42]；组合性变化主要涉及意义提取与成分结构的透明度。

构式化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是 Michael Israel 对英语 way 构式浮现的研究[43]。该构式主要用于表达在较难走的路面开出道路以便通行，通常用作比喻义。起初，该构式中不及物动词（如 go、travel、ride 等）后接表路径的宾语（如 ride、way 等）。至 19 世纪，那些本义不表移动义的动词开始可以进入 way 构式，随着时间推移，构式中的宾语也固定为 way，与其搭配的不及物动词属性也逐渐改变。如今 way 构式中的动词主要有两大功能：表移动方式，比如 creep、wind、sweep 等；表路径开创手段，比如 dig、plough、squeeze 等[44]。两种功能都蕴涵了移动困难、费力等意义。此外，还可基于这两类动词进行类推扩展，吸纳 fight、battle、write 等动词，表示通过间接手段达成目标；吸纳 whistle、hum、haw 等动词，表示伴随移动发生的附带动作[18]970。最终形成的 way 构式，意义愈加图式化，其中的路径成分的强制性也越发明显。

Patten 研究了 it 分裂句构式的历时发展，发现该分裂句原本有两条限制：(1)系动词后只跟名词词组；(2)整个结构只表达已知信息[29]227。但随着时间推移，该构式焦点位置开始容纳除名词短语外的其他类型短语；分裂从句也可表达新信息，而非既成事实。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可能源于构式触发的语义压制，位于焦点位置的非名词短语开始具有所指功能，新信息被当作听者已知或对的信息[45]96。因此，随着使用频率增加，it 分裂句构式开始浮现两种子构式：(1)焦点位置有非名词性成分；(2)分裂从句包含新信息。两种子构式都经由原型分裂句构式扩展而成，未完全承继原型构式特征，但构式压制可解决构式和词汇间不相容的问题。

Dirk Noël 认为在历时构式语法中，语法化应被视为语义演变的高级阶段；构式化则是形义配对的初级阶段[46]。相比 Noël 将语法化、构式化归为语言演变过程中的不同阶段，Nikolas Gisborne 等则认为构式化和语法化过程类似，并列举了以下原因：(1)way 构式和 it 分裂句都显示出演化的方向性，图式化程度和能产性均越来越高；(2)它们的历时发展都呈现出渐进的过程，way 构式体现为单个动词的不断累积，it 分裂句则是短语类别的不断沉积；(3)都与类推有关；(4)都存在构式的重新分析；(5)都涉及构式多义；(6)都有主观化的痕迹，如 way 构式，原本只限移动义动词的空位开始接纳更多情感性和评价性动词[45]97。

3. 构式化与频率固化

在前文论述构式化与重新分析、类推扩展的实例中不难发现，频率固化在语言历时构式化发展过程中亦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基于对形式与意义的重新分析，加上频繁的使用，才促成 be going to，way 构式和 it 构式图式化程度越高，能产性进一步提升。在构式语法框架下，语法化就是图式化的过程。语法化框架下“偏词汇→偏语法”的渐变链，实则是构式语法的“实体构式→图式构式”的层级系统。情态动词遵循“实义动词→情态动词”的典型语法化轨迹，然而，在构式语法视角下，每一个情态动词的产生都首先是新的微构式浮现。之后，当更多实义动词转化为情态动词时，中观构式随即产生。再随着情态动词类别的不断扩充，允许新的微构式的涌入，使得更高层级构式发生改变，成为最终的宏构式。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语言使用是根本。亦如上文提到的复合介词 in spite of，都需要高频率使用到一定程度，自主性渐增，最终独立于原名词词性 spite 之外。在 Coussé 等人看来，“构式正是基于使用并由使用（包括语篇与语境）构建的”[38]12。

三、问题与挑战

认知视域下的语法化和构式化研究在大踏步前进的同时，亦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Bybee[18]12， Alexander Bergs 与 Thomas Hoffman[13]193 认为,历时认知语言学应与语言变化的社会因子结合起来,包括宏观言语社团(如语言的社会分层)和微观个人交际(个体语言使用与处理)两个层面。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并不局限于词汇层面,社会认知因素对语法变化研究也扮演重要角色。Benedikt Szmrecsanyi 发现,除认知因素外,社会因素可以作为历时语法变化研究的重要补充[47]。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语言变化的宏观社会因素,以及更好地将认知因素与社会因素相结合。

另外,过往研究往往只是将心理学或与认知语言学领域的相关发现应用于历时语料的分析,而忽视历时研究的结论可能反哺语言的认知与心理学研究。历时语言学能为心理学或认知语言学带来什么?均一论假设是否经得起检验?Meike Pentrel 已开始触及历时语料与当代语言学理论间的“反馈环”(feedback loop)问题,其在对共时语料观察中所发现的认知局限并未在历时语料中得到印证[48]。那么,基于共时理论基础作出的推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从历时语料中得到印证或推翻?如何解释两者之间的偏差[13]200?是源于历时语料可信度的不足还是由于现今人类认知处理方式与古时存在差异呢?这些问题,仍是悬而未决,需要进一步解答。

历时认知研究不仅能加深对前人认知处理能力的理解,还能揭示认知过程之本质与不同认知进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将来的共时研究。Peter Petré 强调不同认知机制需不同的认知努力,通常认知过程自动化和潜意识程度越高,在历时维度看也愈发稳定;越是有意识的认知过程更易发生改变[49]。将来的研究应关注不同层级的认知机制在历时变化中的不同作用。

语言历时的演变源于语言的共时使用,其基本机制是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包括重新分析和类推)与使用频率固化效应的协同作用。通过梳理语言历时演变的认知机制研究,尤其是语法化和构式化两个研究领域的成果,我们不难看出重新分析、类推、基于语言使用频率的固化,以及隐喻、转喻等基本认知机制在语言历时演变中的推动作用。

传统语法化研究囿于个别词的探讨,更注重形式而非意义,构式语法则将构式纳入语法化讨论范围:(1)既关照形式,也关照意义;(2)聚焦变化结果而非源头;(3)分析变化既可着眼于小处(微构式),也可着力于抽象图式性构式[16]59。另外,构式语法框架无所不包的全局观,与扩展的语法化导向是一致的。语义淡化、具体语义缺失的同时意味着类符扩展、使用环境扩展、甚至型符频率增加,即 Lieselotte Brems 所说变化的“得与失”[50]。从构式语法视角来考察语言演变,并非只展示构式如何变化,更重要的是探究语言演变的普遍模式。语言演变的构式观为考察语言的动态微调、变化的渐进性等提供了理论框架,也能帮助理解具体微构式变化如何与宏构式相联系。

Ferdinand de Saussure 对于语言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区分无疑是开创性的,但我们不应把它们看成是两条互不相干的语言研究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共时语言现象和历时语言变化是密切关联的,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哲学上讲,语言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其共时状态只是相对而言的。语言历时性质的演变只是语言共时使用中由认知机制所导致的微变的累积。这就不难理解重新分析和类推等认知机制在语言历时研究开创之时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另外,语言共时研究理论的创新亦可为历时研究提供新思路和启迪。

参考文献

[1] LAKOFF G. Cognitive models and prototype theory[C]//NEISSER U. Concepts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ec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factors in categoriz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63-100.

[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 FAUCONNIER G.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4] GEERAERTS D. Prototype theory and diachronic semantics: a case study[J].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 1983(88): 1 - 32.

[5] WINTERS M 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spa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ench subjunctive[C]// RAMAT A G , CARRUBA O, BERNINI G. Papers from the VII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1987:407 - 418.

[6] TRAUGOTT E C. From propositional to textual and expressive meanings: Some semantic pragmatic aspects of grammaticalization[C]//LEHMANN W P, MALKIEL Y.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2:245 - 271.

[7] SWEETSER E. Root and epistemic modals: causality in two worlds[J].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1982(9): 484 - 507.

[8] SWEETSER 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9]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0] TRAUGOTT E C, KÖNIG E.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of grammaticalization revisited[C]// TRAUGOTT E C, HEINE B.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1991(1):189 - 218.

[11] CROFT W. Typology and universal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2] GEERAERTS D. Cognitive grammar and the history of lexical semantics[C]//RUDZKA-OSTYN B.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1988:647 - 677.

[13] BERGS A, HOFFMANN T. Special issue on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introduction[J].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017, 21(2):193 - 202.

[14] LANGACKER R W. Syntactic reanalysis[C]// Li C N. Mechanisms of syntactic chang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7: 58.

[15] HOPPER P J, TRAUGOTT E C. Grammaticalization[M].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6] TRAUGOTT E C. Toward a coherent account of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alization[C]// BAREDAL J, SMIRNOVA E, GILDEA S, et al. Diachronic construction 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5:51 - 79.

[17] DE SMET H. Analysing reanalysis[J]. Lingua,2009,119(11):1728 - 1755.

[18] BYBEE J. 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9] AUWERA J , VAN OLMEN D, DU MON D. Grammaticalization[C]//DABROWSKA E, DIVJAK 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2015.

[20] HARRIS A C, CAMPBELL L. 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 BYBEE J, MODER C L. Morphological classes as natural categories[J/OL]. Language, 1983,59(2): 251 - 270 [2021 - 05 - 35]. https://www.jstor.org/stable/413574.

[22] TRAUGOTT E C. A history of English syntax[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2.

[23] BARDDAL J. SMIRNOVA E, GILDEA S, et al. Diachronic construction gramma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15.

[24] HIMMELMANN N.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ization: Opposite or orthogonal? [C]// BISANG W, HIMMELMANN N, WIEMER B. What makes grammaticalization? A look from its components and its fring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2004: 31.

[25] BYBEE J. Usage-based theory and Grammaticalization[C]//NARROG H, HEINE B.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6] HOPPER P J.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C]//TRAUGOTT E C, HEINE B.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1(1):22.

[27] HEINE B, CLAUDI U, HÜNNEMAYER F.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28] TRAUGOTT E C. Grammaticalization[C]//LURAGHI S, BUBENIK V. A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Continuum Press,2010: 272 - 276.

[29] PATTEN A L.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it-cleft construction[C]//TRAUGOTT E C, TROUSDALE G. Gradience, gradualnes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10.

[30] HEINE B. Grammaticalization as an explanatory parameter[C]//PAGLIUCA W. Perspectiv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1994:255 - 287.

[31] BYBEE J, PERKINS R, PAGLIUCA W.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32] GIVÓN T. The genesis of syntactic complexity[M]. 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8.

[33] HEINE B, KUTEVA T.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34] TRAUGOTT E C. Constructions in grammaticalization[C]//JOSEPH B D, JANDA R D.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2003: 624 - 647.

[35] HEINE B. On degrammaticalization[M]//B. Blake, K. Burridg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001: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3:163 - 179.

[36] BYBEE J.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grammaticization:the role of frequency[C]//JOSEPH B D, JANDA R D.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2003:602 - 623.

[37]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5.

[38] COUSSÉ E, ANDERSSON P, OLOFSSON J. Grammaticalization meets construction gramma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8.

[39] HILPERT M. Three open questions in diachronic construction grammar[C]//COUSSÉ E, ANDERSSON P, OLOFSSON J. Grammaticalization meets construction 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8:24.

[40] HILPERT M. Constructional change in English: developments in allomorphy, word formation, and syntax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16.

[41] TRAUGOTT E C, TROUSDALE G.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42] BARDDAL J.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ase and argument structure in Icelandic[M]. 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8.

[43] ISRAEL M. The way constructions grow[C]//Goldberg A.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Stanford:CSLI,1996: 217 - 230.

[44] HILPERT M. Historical linguistics[C]//DABROWSKA E, DIVJAK D. Cognitive linguistics: a survey of linguistic subfields. Berlin:De Gruyter Mouton,2019: 126.

[45] GISBORNE N, PATTEN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grammaticalization[C]//NARROG H, HEINE B.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92 - 104.

[46] NOËL D. Diachronic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J]. Functions of Language, 2007,14(2): 195 - 196.

[47] SZMRECSANYI B. The English genitive alternation in a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perspective[C]// GEERAERTS D, KRISTIANSEN G, PEIRSMAN Y. Advances i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2010：141－166.

[48] PENTREL M. The position of adverbial clauses in Samuel Pepys's diary(1660 — 1669)：a cognitive historical study[D]. Osnabrück：Osnabrück University，2015.

[49] PETRÉ P. The extravagant progressive：an experimental corpus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emphatic [BE Ving] [J].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017，21(2). 227－250.

[50] BREMS L. Layering of size and type noun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M]. Berlin：De Gruyter Mouton，2011：94.

An Overview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WANG Shan-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Guangdong，510006，China)

Abstract: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language stems from its synchronic use. The basic mechanism of language evolution is the coordination of people's basic cognitive abilities (such as reanalysis and analogy) and the frequency-based entrenchment effect. By elaborating on three major cognitive mechanisms (reanalysis, analogy and frequency-based entrenchment) in language use and their instantiations in diachronic linguistic changes, we can delineate the propelling function of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language. Based on what is mentioned above, the researcher ruminated on some problems in current linguistic studies within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and charted out the future direction, i.e., to establish the "feedback loop"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achronic corpu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 theories, which coul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people's cognitive processing capacity, the nature of cogni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gnitive processes, making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ynchronic study.

Key words: diachronic study;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analysis; analogy; frequency-based entrenchment; grammaticalization; constructionalization

〔责任编辑：何敏敏〕